

中华

文明概论

王炜民
郝建平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K203/125

2005

包头师范学院学术专著资助项目

中华文明概论

王炜民 郝建平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明概论/王炜民,郝建平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4

ISBN 7-81074-813-0

I. 中… II. ①王… ②郝… III. 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113 号

书 名	中华文明概论
著 者	王炜民 郝建平
责任编辑	邓池君
封面设计	张燕红
出 版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010021)
发 行	内 蒙 古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内蒙古瑞德教育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32
印 张	11.25
字 数	300 千
版 期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7-81074-813-0/K·57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黎 虎

王炜民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华文明是其中的重点之一,继 1999 年出版《中华文明简史》之后,现在又与郝建平副教授合作推出了其姊妹篇《中华文明概论》,可见其用力之勤。前书以史为纲,纵向论述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历程,后书以论为经,纵横交织阐发中华文明的真谛。两书可谓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史的完整架构与体系。王炜民教授索序于我,我在欣然拜读后,颇感获益匪浅,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开拓创新特点的著作,它与当前学术界广泛流行的中华文明史不同,不是按照历史顺序、就事论事进行叙述,而是对中华文明诸问题进行理论性的阐述和探索;不是仅仅局限于历史上的中华文明,而是涵盖历史的、当今的及其未来走向问题。这样就拓展了中华文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别开生面,从而起了将其推向一个新台阶的作用。本书不仅有发凡起例,建构体系之功,而且其论述亦颇有深度,我以为它至少具有如下几方面鲜明的特色:

一、理论为先,深度开掘

重视理论探讨是本书与《中华文明简史》重要的区别之一,因而这是本书用力之所在和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本书首先对“中华文明”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探讨。关于“中华”,作者指出“大约在魏晋





时期,由‘中国’与‘华夏’复合而成的‘中华’一词已经出现,词义兼有二者的义项。”而“从南北朝开始,‘中华’一词已突破了‘华夏’主要指汉族的局限,开始向包括中国各民族的词义发展。”关于“文明”,本书着重探讨了“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联系十分紧密的概念之间的区别,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纵向而言,从历史发展阶段看,‘文化’是人类相对于动物状态的一种禀赋,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而‘文明’是相对人类自己的野蛮状态而言的,是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横向来看,在实际运用中二者词义包含的范围不尽相同。一般说来,文化可包括正、反两个方面,而文明主要包含正面的内容。”这种区分实际上是将文化史与文明史作了科学界定,从而对于这两门姊妹学科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职是之故,作者认为“中华文明”乃指“包括当代 56 个民族以及曾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古代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应当说这一理论概括是准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在此基础上,本书又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范畴进行了界定,认为“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具体而言,从个人的文化修养、科学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审美修养、精神境界,到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和风俗习尚,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上述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概括,不仅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弘扬中华文明的意义所在。本书就是以此作为指导思想,展开对于中华文明的探讨,力图揭示中华文





明的真谛和价值。

这种理论性的探索和概括,可以说贯穿于全书。例如关于中华文化的特点,本书概括为源远流长、崇尚统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注重实用、强调道德等六个方面。关于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总结了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求是务实的精神,宽容的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民为邦本的精神等五个方面。关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概括为整体思维、矛盾辩证法思维、直觉思维、象征思维、实用理性一知行合一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伦理性倾向、经学思维方式等七个方面。这些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高度概括和理论提升,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学术价值。本书这些理论性的认识,完全是从中国历史的实际中抽象出来的,仅以上述中华传统思维方式中七个方面之一的“整体思维”来说,就是综合了《易经》以及《易传》作者,把天、地、人一起纳入八卦、六十四卦的系统,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规律,把一切自然现象与人事贯通起来的整体思维;孔子、孟子、董仲舒等赋予“天”以更多的政治、伦理色彩,把天道作为人道的依据,进一步强化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以及道家将“道”和“德”合一为天人合一境界。说明儒道两家是从不同角度主张“天人合一”,道家倾向于把人自然化,儒家倾向于把自然人化,而他们都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气相通、一理相通的;到了宋明理学阶段,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已成为儒家学者的一致模式,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高扬到了极致。此外,中华民族整体的思维方式还从中国古代具体思维模式——五行模式,以及中医科学、语言文字、建筑风格、穿着习惯等方面表现出来。在此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所谓整体思维,就是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和物、自然和社会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中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





一个整体。中华民族这一思维方式的揭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中华文明的这种理论性的深度开掘,是值得提倡的。这里还需要指出,作者不是从西方学者那里寻找现成的理论来套中国的实际,而是从中国的实际中进行归纳、提炼,从而发现其规律性的特征,上升为理论性的认识,这种方法也是值得治中国史者效法的。我们并不反对学习西方理论,但是如果能够从中国历史实际中抽绎出理论性的认识,应当是更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也是更有意义的。仅举一例以窥一斑。由于本书将中华文明界定为“包括当代 56 个民族以及曾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古代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因此本书专门设置“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这一章节论述我国少数民族自古以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他们对于中华文明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创新之举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而且更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从而提升了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

二、论从史出,资料翔实

本书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论性探讨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其所有观点和规律性的阐述,都是从历史实际中抽象和凝练而来的,因而资料翔实是本书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举凡经、史、子、集,考古资料,出土文书,金石碑刻,中外学者的论著,均在其视野之内,广为搜寻,旁征博引,从而使本书的许多观点和结论奠定在扎实的史实基础之上,因而是可靠的,令人信服的。例如,关于中华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从 20 世纪 20 ~ 30 年代开始,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直到目前为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主要有仰韶文化说、龙山文化说、夏代说、商代说等四种观点。本书对此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根据城市、文字、金属工具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为综合构成文明最基本的标志,本书认为距今 5000 至





4000 年我国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是中华文明史的序幕时期。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本书从多方面多层次并列大量资料进行了论证:首先,文字是文明重要的标志,山东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刻有 11 个书写符号的陶片,陶寺城址的晚期居址中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用毛笔朱书的字符,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在陶器、玉器上的多种刻画符号,以及多字相连的陶文等,证明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原始文字。其次,金属工具的发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大标志。本书指出龙山文化时期铜器出土地点分布区域广大,东起山东,西达甘青,北抵内蒙古,南至湖北,发现有早期铜的遗址已超过 25 处。铜器的质料既有红铜、青铜,也有黄铜。出土铜器的数量少则一件,多则三十件。铜器的种类有刀、锥、钻、凿、斧等手工业工具,镜、容器、装饰品等生活用具以及斧等武器,可见铜器的使用范围比较广泛,冶铜工业已初具规模。第三,城堡的出现是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争夺人口和财富的战争日益激烈,阶级矛盾不断加深的产物,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从而成为文明社会到来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本书指出在黄河、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陆续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址有: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垸、石首走马岭;湖南澧县城头山等,共计约 20 余座。此外,新近发现的还有四川崇州市燎原乡紫竹村的新石器时期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陶寺古城址的发掘自 2001 年春至 2003 年秋,也已获得重大成果。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城堡已不是个别而是普遍出现了。第四,礼仪性建筑物也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之一。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瑶山祭坛,余杭反山东南大观山果园发现的祭坛均已相当壮观。陶寺城址祭祀区内,不仅建筑面积大,而且祭坛、台阶、路沟、角门等一





应俱全,设计和夯土都十分讲究,出土的祭祀器物也十分丰富。其中发现的“观象台”表明观天象、祭天神的出现。证诸文献记载,传说中尧的时代对天文历法已有很大发展,尧不仅自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而且派遣羲和、羲仲去管理历法与授时,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观象台”遗迹的发现,证实了《尚书·尧典》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具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此外,本书还从阶级分化的遗迹,作为文明的支撑的财富生产、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生产门类进行了论证。通过这些广泛的、翔实的分析,文明曙光出现在古代东方地平线上的一幅生动图景已跃然纸上,作者从而得出结论:“龙山时代作为文明主要标志的文字、城市、金属工具、礼仪性建筑、阶级分化等因素已出现且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剩余的出现、专门手工业生产形成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认为当时已跨进了文明的门槛。”但是作者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进一步把考古文化与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结合起来,以考古文化为主体,适当利用文献材料中的有关记载进行总体考察,分析了在《尚书》、《左传》、《史记》等著作中,有关尧舜禹时代已经有了阶级对立和雏形的国家机器的记载,与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是相符的,进一步认定“龙山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这个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三、中外对比,突出特色

抓住事物的特点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研究中华文明首先应当揭示其特点,方能认识中华文明的本质和价值,而所谓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而存在的,因而必须通过与其他文明的相互对比中才能揭示的。本书在研究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始终注意进行中外对比,在这种对比之中揭示和突出中华文明的特色。本书认为“只有把握了中华文明的特点,才能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才能认





清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才能扬长避短,让中华文明光照千秋。”而把握中华文明特点的重要途径就是从中外对比中去获取。例如,作者认为“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数千年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因而本书将“天人合一”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点之一加以阐述,指出“‘天人合一’思想认为自然界与人是协调统一的,主张人要遵循自然规律,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西方人强调征服大自然,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但是,现在科学发展的结果,居然带来负面影响,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中华文明中‘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对于养身,对于治国,对于处理国际关系,对于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都是有价值的,有现实意义的。”通过这一对比,“天人合一”这种古老思想的意义得以深刻地揭示。本书将人本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指出这种传统观念“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弘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作者通过中外对比进一步指出:“中华传统的人本思想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人本观念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尊严,民主观念是通过对人权的肯定导出人格平等。人性与人权、人本与民主具有相通性,但不能等同。不过,人本思想仍然可以成为民主思想的基础。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必要从传统的人本思想中吸取有益养分。”作者之所以对于中国古代人本思想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就是基于从中外对比中把握了这一传统思想的特点和精义。注重实用也是本书所揭示的中华文明特点之一,认为“中国传统文明以解决社会人生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执著于对政治、伦理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探求。”





这种注重实用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华民族在诸如宇宙观、宗教观、生死观等方面与西方世界的明显差异,例如“中国人少有对死的极端恐怖,也就缺乏对彼岸天国的热望。中国人信教不是解决死亡这种生命中的根本问题,而是解决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问题,甚至把宗教作为高雅的消遣。几乎中国以外任何形式的宗教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死后,放在来世,惟独中国道教关注的重心就在今生:如何享受今生,如何长生不死,纵然是死,也想求个肉身,白日飞升。对于外来的佛教以及明清东渐的西方基督教,祖先们都采用了以本土文化为主体的接纳、受容方式,而没有在思维方式层面沿袭、照搬。”尽管中国从古代以来宗教一直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几乎任何宗教都没有在中国取得国教地位,而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其原因可以从这里得到很好的解答。

中华文明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几千年来未曾中断,载籍相承,家珍可数,为古代六大文明之硕果仅存,这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所不能比拟的。本书对于中华文明这一重大特色给予格外重视,不仅详细论述了大家已经注意到的中国古史记载丰富多彩、绵延不绝的问题,而且特别提出经书注疏在中华文明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设置专节论述“从经书注疏看中华文明的传承”。作者指出中国古籍注疏起源于三代,经春秋战国发展,到了两汉注疏体例已经大备,逐步形成了注、解、释、音、笺、章句、解诂等注疏学,产生了集解、集释、集注、训纂、正传、索隐、考证、斟注、通释、间诂、合注、集成等多种多样的名称和形式,成为独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传统学问和文化体裁,对于保存和发扬中华文明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这一独步世界的文化特色,不仅为中华文明,也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外对比的基础上,突出中华文明的特色,无疑将大大加深我们对于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正如作者所





指出的：“中华文明是在中华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本土文化，尽管也在随时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先进成分，但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色。”“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受中国社会文明发展道路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地理结构的影响，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它是中华文明内在特质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中华文明的成果，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全面的振兴，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立足现实，古为今用

立足现实，古为今用是本书另一个突出特点，作者对此有着自觉、明确的认识，开宗明义指出“弘扬中华文明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领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综合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型时期，也带来了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亟待解答。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全球化与本土文化关系问题，亦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改革、开放和创新中，是否还需要继承、借鉴和发扬中华文明的问题。作者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本书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和贯彻这一主旨：一方面弘扬中华文明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弘扬中华文明是加强素质教育的需要。把后面一个问题置于与前者并列的地位，体现了作者深邃的眼光。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在这样一个竞争空前剧烈的时代保持先进地位，关键在于是否有高素质的国民。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否能够沿着正确的、健康的方向前进，取得更为光辉灿烂的成就，取决于人的素质，尤其是青少年的素质。而弘扬中华文明对于培





养高素质的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智慧,对于正确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人生都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而“弘扬中华文明就要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了解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感受前人的聪明才智,学习前人的优良品德和创造精神,这无疑将起到开发人的心智、启迪人的思维、给人以历史智慧的作用。”为此,本书特别设立“素质教育与中华文明”一节,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从素质教育的内涵和特征、实施素质教育的必要性以及素质教育与中华文明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实施素质教育离不开中华传统文明的已有成果。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明一直薪火相传,岁月的转换并不能导致其完全断裂。这一事实本身充分昭示:这种文明必然具有许多优秀、合理的因素和强大的生命力。”因而“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决不能也不可能抛弃中华传统文明,而只有对传统进行认真的审视和选择,予以合理的继承、创新,才可能实现教育改革的目标。”本书详细论述了从中华文明中汲取精华和营养以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内容和重要意义,指出:“当今世界科技日益进步,生产力不断提高,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也迅速增加,人类的物质文明程度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许多危机和问题。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锐减、气温升高、沙漠化加剧、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等难题正日益困扰着人类。在一些发达国家,掌握高科技或者是生活在高科技社会当中的人,由于忽视了人文素质教育,而造成素质上的缺陷、个性发展上的畸形,导致精神空虚,人格堕落,人际关系冷漠,甚至异化为所谓‘经济动物’、‘科技奴隶’或者是‘智能强盗’,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影响社会的协调发展。而在我国类似的问题也存在,如享乐主义滋生、个人主义膨胀、道德水准下降,市场上的假冒伪劣,经营活动中的坑蒙拐骗,社会生活中的贪污腐败、吸



毒贩毒、偷盗扒窃、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特别是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出既有知识和能力又有健康人格,既会做事又会做人的合格人才。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学习,而通过人文素质教育,能够使这些宝贵的资源在人才培养中发扬光大,并且与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文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作者的忧国忧民之思跃然纸上。类似这样从中华文明的传统中探求对于今天现实问题的借鉴,几乎贯穿于全书的论述中。

但是本书并没有满足于对中华传统文明一般的借鉴,而是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探求开拓建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方向和道路。例如,在“从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看中华文明”一节中,作者认为尽管中华传统价值观有许多优秀的精华,但是它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必须在继承我国传统价值观中有益的内容,以及借鉴西方价值体系中的有用成分的基础上,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价值系统。本书认为这种新型的价值系统应包括如下一些内容:第一,以科学技术为本。第二,坚持群体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第三,在义利关系上,把道德价值和道义价值放在第一位。第四,在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中,应更加注重天人和谐,以寻求天人合一,持续发展。第五,在国与国的相互关系上,更加注重国际和谐,以便反对霸权主义,粉碎西方分化阴谋,力争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第六,在身与心的内在关系上,更加注重身心和谐,寻求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此外,在“从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看中华文明”一节中,作者对于在当今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中华传统民族精神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主精神。(二)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一步增强民族的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三)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培养中华



民族的科技意识。(四)艰苦创业、自觉献身的精神。(五)祖国统一、世界和平的精神。凡此种种,均体现了本书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传统经世致用精神在新时代的发扬。

本书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需要继续改进之处。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其用力深浅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关于史学和经学注疏、关于古代教育、关于传统思维方式等问题的探讨相对来说是比较深入的,其中不乏新意和真知灼见;而有些章节,例如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功能作用的论述,相对来说就显得比较薄弱,未能较好地展开论述,给人浅尝辄止之感。即使在同一序列中的问题也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在“辉煌灿烂的古代精神文明”一节中,哲学、文学等门类的论述还不如艺术方面详细,前者几乎是一带而过,而与中国古代哲学、文学的丰富性和重要性显得不大相称。这种不平衡,也与本书编排布局有一定关系,例如在“辉煌灿烂的古代精神文明”一节中有“教育”这一子目,只是简单几句而语焉不详,这是因为后面还有“从古代教育看中华文明的传承”这样一个独立的章节论述这个问题,自然就不得不如此处理了。此外,体例之前后尚有不够一致之处,文字表述及其风格也还可进一步修饰统一。然而瑕不掩瑜,总的来说这是一部成功的关于中华文明的著作,本书所建构的中华文明的学术理论框架无疑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必将推动中华文明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谨识于 2005 年 3 月 6 日

导论 弘扬中华文明的重大意义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智慧,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文明成果简言之,即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巨大财富。中华文明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才能和聪明智慧,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和精神风貌。其内容也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向前发展。因此,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面,对弘扬中华文明的意义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深远的历史意义

弘扬中华文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可从学习了解中华文明史和研究总结中华文明史两方面加以理解。





1. 中华文明发展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中华文明史的意义与学习中国历史的意义相同。

历史有其承继性,无法人为地割断,今天的中国与昨天的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江泽民同志 1996 年 6 月 21 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我们学习历史,并不是单纯地为了了解历史知识而学习,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现实社会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对将来的发展有一个正确的把握。

例如,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面推行计划生育。2001 年 12 月 29 日已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第 63 号主席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那么,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呢?这是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实行的一项重大政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我国古代有着强烈的宗嗣继承、传宗接代的观念,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因而历来鼓励繁殖人口,人口增殖速度很快。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我国人口达到 6 亿,占到世界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且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初期至 70 年代中期、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中期,连续出现三次生育高峰,约 40 年间人口总量又翻了一番。可是,我国拥有的可耕地面积只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的 7%。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最重要的基本国情,因此实行计划生育事关民族兴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是形势所迫,也十分必要。近 30 年来,我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实

